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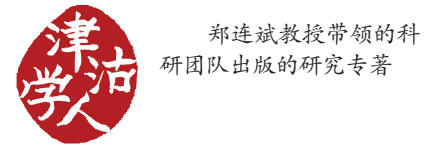
跟郑连斌老师初识于2006年秋天,那时我刚到天津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学位,虽然本科是学理科的,但我对民族学和历史学比较偏爱,正好郑老师的科研方向涉猎这两门学科,选导师时,经过等待和争取,我如愿以偿成为他的学生。

随着日常接触的增多,我对郑老师的了解也逐渐深入。

如果从1981年做本科毕业论文开始算起,郑老师从事中国民族体质人类学研究已有四十多年了,科研已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在确定自己的科研方向上,《中国八个民族体质调查报告》这本书给了郑老师很大的启发,他曾回忆道:“序言中有句话‘民族体质调查研究意义的重大,不在人口普查之下’引起了我的注意。于是我开始思索,这项工作我也能做。”1989年,郑老师在内蒙古师范大学组建了生物人类学团队。1991年,他的第一个科研项目“内蒙古蒙古族、汉族、朝鲜族和回族四个民族体质人类学与中国体质人类学”获批,当时经费只有8000元。郑老师非常珍惜这笔经费,带领团队第一次离开呼和浩特,去兴安盟的乌兰浩特市开展了东北汉族、科尔沁蒙古族、朝鲜族的经典遗传学指标的调查,使这些族群有了自己的上眼睑皱褶、内毗褶等经典遗传学数据。那是团队第一次赴野外工作,郑老师后来回忆说当时自己心里是很兴奋的,但也有些迷茫、忐忑,所幸首次野外调查还是比较顺利的。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初第一个10年,是中国体质人类学发展比较艰难的阶段。老一辈体质人类学工作者已陆续退休,加上微观研究、基因分析等技术的发展,宏观体质人类学研究的空间被大大压缩,没有经费,一部分年轻人的科研开始转向,一些具备良好研究基础的体质人类学团队解散,传统体质人类学研究呈现冷落、萧条之况。然而郑老师却心无旁骛,带领团队坚持下来。其间,他先后主持了“内蒙古7个民族18项指标的人类群体遗传学研究”“中国僮人、克木人等6个人群的体质人类学研究”“中国11个少数民族体质特征的人类学研究”这3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其中第一个项目的实施是郑老师1997年调到天津师大后进行的,他带领团队去内蒙古呼伦贝尔盟(今呼伦贝尔市)、兴安盟等地调查了阿拉善蒙古族等18个族群的舌运动类型、不对称行为、面部观察指标等25项人类群体遗传学指标。2002年开始,郑老师带领团队完成了布依族、京族、佤族等11个民族的头部、皮褶厚度等体质数据调查。2005年开始,他又率队完成了彝人、克木人、僮人、布依亚特人、图瓦人、云南蒙古族的头部、围度等体质测量工作。正是因为郑老师带领团队所做的这些工作,使上述族群有了历史上第一份完整的体质人类学数据,助力中华民族体质数据库的进一步完善。

我在跟随郑老师读研期间,参加了僮人、图瓦人等族群的体质测量工作,深刻体会到民族体质调查工作的艰辛与不易。第一次跟郑老师出外做调查是去西藏,从当地民委联系到入户测量,他都事必躬亲、全程参与。在进行僮人的体质调查时,为了让



郑连斌教授带领的科研团队出版的研究专著

测绘中国民族体质地图

——记我国体质人类学家郑连斌教授

张兴华



数据样本量多一些,我们一村又一村、一户接一户地转,直至把能去的地方都跑遍。郑老师对我们说,做科研就要有执着与坚守的精神,始终初心不改。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我们所调查的地方有时上不去,大家就下车背着仪器徒步前行;年纪最大的郑老师经常快速走在队伍最前面,他不想让村民们等待太久。

是否主持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点)项目,是考验一个研究团队科研实力的重要指标。1996年,在南京召开的中国解剖学会学术年会上,在内蒙古医学院(今内蒙古医科大学)解剖学前辈朱钦先生的鼓励下,郑老师提出开展中国汉族的体质研究,得到了人类学专业委员会的认可。会后,郑老师连续两年申报关于汉族体质研究的面上项目,均未果,后来把研究对象锁定为中国少数民族,但他对中国汉族体质的想法一直未泯。2007年,郑老师拜访朱钦先生时又提起此事。朱先生说,一个面上项目难以完成汉

族体质研究,不如干脆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来完成汉族体质的测量工作。

汉族体质研究课题很大,单凭天津师范大学一个学校难以完成,郑老师决定和内蒙古师范大学、辽宁医学院(今锦州医科大学)的同仁们合作来申报项目。2009年,由上述三所高校联合申报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汉族体质人类学研究”获批,这是我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汉族体质调查。立项后,研究工作随即展开。团队跨越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等22个省、自治区,对31个城市汉族族群,36个乡村汉族族群开展了指标较齐全、大样本量的人体测量学研究,共测量4.3万个汉族成年人的头部与体部数据,通过大量翔实的数据破译了汉族人体质“密码”,也为生物学、遗传学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强大的基础数据支持。该项目于2012年顺利结题,郑老

师领衔编写出版了《中国汉族体质人类学研究》,这是国内第一部专门研究中国汉族体质的专著,为后世留下了21世纪之初中国汉族人比较详细的人体数据。长期从事田野调查研究,面对的是严峻的自然环境和艰苦的生活条件,但郑老师很少有感到疲惫的时刻,对科研总是充满热情,如同科研道路上的“愚公”。2013年开始,他又带领团队开展了“中国革家人、摩梭人等9个族群的体质人类学研究”这一项目,对贵州革家人、西双版纳傣族、川滇边区泸沽湖畔的摩梭人、新疆维吾尔族、西藏喜马拉雅山区的夏尔巴人、海南临高人、五指山下的黎族、甘川边界大山中的白马人、四川阿坝州的羌族等进行了体质人类学研究。

2015年,郑老师团队参加了复旦大学金力先生主持的科技部基础性工作专项“中国各民族体质人类学表型特征调查”,主持课题“藏缅语族等少数民族体质人类学基础表型特征调查”,完成了哈尼族、基诺族、白族、拉祜族、彝族等16个族群的体质人类学表型特征调查。除了面部与体部测量工作外,还有民族语音、头型人像、生化指标、遗传样本、身体成分等项目采集工作,任务十分繁重。这项工作为中国民族表型数据库的建立作出贡献,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与应用价值。几年来,团队转战于云南、四川、贵州、西藏的大山里,辛苦甚于往常。郑老师几乎参加了所有的野外调查工作,考虑到他年事已高,团队成员都劝他不用亲赴采样地,在后方坐镇指导就好,但郑老师为了确保调查顺利开展,总是和团队一起下村寨、爬高山、入森林、越河流,冲在田野调查的最前线。

郑老师常说,他在科研上取得的成绩离不开前辈的无私帮助,特别是朱钦和杜若甫两位先生的精心指点,

他一直铭记于心。而他也以两位先生为榜样,对学界同仁,尤其是新人总是给予有力的扶持。几年前,当徐飞教授团队因为教学任务重,难以完成傈僳族、怒族、独龙族体质调查工作,向项目组求助时,郑老师二话不说,带领团队接下这个任务。第二次深入怒江大峡谷,克服重重困难,圆满完成了这3个民族的体质测量工作。在郑老师身边工作,收获的不仅是科研成果,更有精神层面的激励和振奋。郑老师带领团队外出调查,少则二十天,多则一个多月,完成了一个族群的体质测量,我们一起走过祖国很多地方,汗水洒在了一片片的热土上。多年来,郑老师培养的一届届研究生,接力耕耘在体质人类学的沃土上,在野外年复一年、一次又一次的奔波中,在辛苦工作的同时,接触到乡土的自然气息,领略到少数民族的多彩风情,也欣赏了祖国山河的壮丽。这些经历是学生一生难以忘怀的。

郑老师到天津师大工作后,担任过生物系系主任,作为学科带头人建立了遗传学硕士点,迄今已培养了30多位研究生,大部分毕业后投身于科研和教学一线。他还一手建立了天津师大体质人类学团队,科研能力在国内民族体质人类学研究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四十余年如一日,郑老师带领团队通过观察、测量以及生物分析等方法长期研究我国各民族的体质特征,目前已开展了38个少数民族和22个省的汉族体质研究,获得了超过6万人的400多万有效体质数据,建立了全国最大的体质人类学数据库,解决了我国没有系统的民族体质类型记录问题,原创性地勾画出一幅详尽的民族体质表型“地图”,使天津师大成为我国体质人类学宏观研究的“重镇”。

郑老师带领团队取得的研究成果,从体质人类学角度证实了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不断融合发展,印证了我国各民族骨肉亲情不可分割;通过民族体质数据数十年的前后对比分析,为国家民族扶持政策提供了体质数据支撑;展现了中华民族体质特征的共性,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体质人类学依据。正因为对体质人类学的突出贡献,郑老师于2020年在上海人类学学会学术年会上荣获业界最高荣誉“人类学终身成就奖”(即“金琼奖”)。

(作者系天津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教师)

【学人小传】

郑连斌,1948年生人,江苏淮阴人。天津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著名体质人类学家。1978年入内蒙古师范大学生物系学习,1982年毕业留校任教。1997年调至天津师范大学生物系工作。培养了天津师范大学与内蒙古师范大学两支体质人类学科研团队,科研能力在国内民族体质人类学领域处于领先水平。2019年获天津市道德模范提名奖。2020年获人类学终身成就奖“金琼奖”。2021年获天津市最美科技工作者、天津市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带领科研团队相继出版《中国汉族体质人类学研究》《中国蒙古族体质人类学研究》等专著。

天津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天津日报 合办

天津“因河而生,向海而兴”,河、海之间的自然条件与天津城市发展是一种内在的、本质的关系:是通海达海的自然地理与人文坐标,最初界定了天津的城市属性、空间布局、历史地位、文化特征,最终形成天津直至今天的“海河—津滨”城市发展轴心。“河海之间”加上“海河—津滨”的时空轨迹、城市轴心,是探讨天津城市发展和文化构成的主要参照系,其中蕴含了天津城市历史文化的底层逻辑。作为天津的“母亲河”,“海河”的名称本身也很好地标示了这种“河海之间”的“津派文化”的基本特色。

不过,这里“河海之间”的“河”,首先是京杭大运河。运河实际上是内陆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标志。一方面,运河及沿运河形成、兴盛的城镇,比如杨柳青等,代表着天津内陆河运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空间边缘与文化维度;另一方面,天津的海岸线和沿海港口,比如军粮城,代表了天津作为海港城市深具海洋文化这一文化历史特征的另一维度。在这二者之间,海河作为津滨双城之间的联络通道和城市发展主轴,彰显了天津之所以为天津的根本要素与文化特质。至少隋唐以来一千多年的天津城市发展,其主要轨迹就是在这条“海河—津滨”的轴心上移动:从唐代军粮城作为海港城市的崛起,到港口沿着大直沽、三岔河口逐步内移,天津逐渐“沿海不见海”地走向内陆化;再到上世纪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功能区域建设,新世纪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津滨双城规划,彰显了从“海”到“河”、再从“河”到“海”的空间位移和历史波瀾。

历史是照进现实的镜子,同时现实也要求我们对历史作更加通透的认知。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主城区或核心区不断变动与迁移的现象不足为奇,比如西安。今天的西安主城区,主要围绕明代的西安府城垣地带发展、绵延开来,但从西周镐京、秦咸阳城、汉长安城、唐长安城直到今天,西安城市中心地理位置经历了一个不断变迁的过程。这些历史城区与现在的西安主城区都有远近不等的空间距离,但西安作为“十三朝古都”的城市历史,在串联起半部中国史的同时,也带给今天的西安以更加开阔的空间格局认知和文化厚度。今天天津滨双城的格局,可以说是全面再现了天津“河海之间”的自然条件和历史文化构成的本来面貌,体现了经济社会发展必然趋势,也应该解释“津派文化”的历史成因、谋划“津派文化”未来发展的主要参照。

因此这里所说的,不是简单地从历史沿革或行政区划出发,也不是从线性历史观和单一因素进行的推定,而是需要一种自然与人文、时间与空间、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融通视野和综合考虑。历史文化的观念意识深刻影响着人们当下的认识层次与实践方式,反之亦然。对于“河海之间”的“津派文化”的特征与具体问题过去有过很多探讨,在今天需要的是面向未来,面对“津派文化”的优势和不足,我们应该做些什么。这就需要更加全面、立体、客观并适应今天需要的文化历史认知坐标。“河海之间”“海河—津滨轴心”的文化历史坐标,将天津城市文化的认识视野延伸至中华文明的纵深时空,反映了中国大历史的潮汐,有助于重新认识天津城市发展大势,也有助于融通历史文脉,吸收中外优秀文化成果,建设守正创新、古今交融、昂扬向上、面向未来的天津城市文化,擦亮“津派文化”的金字招牌。

文化的力量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面对新世纪新时代表展前景与京津冀协同发展等重大国家战略,天津也将迎来发扬光大“津派文化”深厚底蕴的重要机遇。在“河海之间”与“津滨轴心”的文化历史坐标面前,需要以坚定的文化自信和中华文化主体性立场,在不断加大历史文化资源的发掘、保护、恢复、重建、研究、开发、宣传的力度的同时,建议由相关部门出面,组织各方面力量进行系统的顶层设计,梳理天津文化蕴含的中华传统文化、地域性的民俗文化、外来文化之间的层次与关系,有序引导与深入推进古今中西文化元素,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更高的层面上实现融会贯通与综合创新,让“津派文化”实现新的升华与新的发展,不断开拓“津派文化”新的文化实践领域,服务于今天的现实生活与经济社会的发展。

在这个意义上,从“河海之间”“津滨轴心”的历史文化坐标来探讨天津文化和“津派文化”,就不只是一项纯粹学理层面上的研究工作,而是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是一项具有观念革命与现实导向作用的系统的文化工程。这一工程的核心,是重新构筑“大天津”理念。“大天津”不只是空间和体量上的“大”,不只是核心区域的区划与幅员的简单放大,也不只是天津自身的“大”,而是契合着历史文化脉络,在历史与现实的统一视野当中,重塑人们关于“天津”的开放性、延展性、立体性的文化时空观念与历史文化意识,重建具有深广的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链接的天津历史文化认识坐标,借此大幅度地拓展天津城市文化视野纵深与文化实践格局,从中华文明的整体出发来重构天津城市文化谱系,将“津派文化”带向新的时代,力争为天津市文化发展建设发挥某些基础性的助力作用。



张大为

河海之间的「津派文化」

津派文化谭(二)

【学人】说老字号

上世纪20年代初,就职于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傅泊川,结识了时任南开学校校长、中国奥林匹克运动先驱张伯苓先生。二人志同道合,交往甚密,如何发展中国的体育是他们经常探讨的话题,在“体育救国”的思想影响下,傅泊川萌生了创建一家体育用品生产厂的想法。1922年,在张伯苓的帮助下,傅泊川等兄弟六人凑得资金800元,在天津南开学校对过租界门面铺房两间,6月15日,前店后厂正式开张,即“春合制球厂”,傅泊川任总经理。

建厂初期,由于缺乏管理经验,销路并不理想,傅泊川决定从技术上入手帮助企业摆脱困境,他将春合的产品提供给南开学校体育活动使用,征求师生在使用过程中的体验感受,从而不断改进产品工艺,提高产品质量,产品销路由此逐渐打开。

1924年,随着制革科、球拍科、靴鞋科的设立,企业更名为“春合体育用品制造厂”。到1929年,春合厂产品已延伸至体育运动服装,并于同年取得“醒狮”与“春合”两个注册商标,商标名寓意国人觉醒、民族振兴。“醒狮”商标用于球类和皮制产品,“春合”商标用于运动鞋、运动服产品。此后多届华北运动会和全国运动会大会,均采用春合的产品,春合声名大振,产品销售遍布全国,并远销东南亚、日本、英国、美国。上世纪30年代后期,正当春合的发展蒸蒸日上之际,七七事变爆发,国家蒙难,春合停产。直到1949年,春合与祖国一起迎来曙光和希望。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迎来新生。在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春合迅速招兵买马重整旗鼓,生产规模不断恢复和扩大。到1952年初,已基本恢复到抗战前鼎盛时期的水平。1954年5月,通过前期积极筹备,春合成功改制为天津市第一批公私合营企业。后按照政府要求重新对行业进行划分,春合与1921年建厂的生利合并重组,把春合制球和制革车间并在利生,利生所有器材生产并入春合,形成北方两个专业厂,利生专业制革,春合专业制作器材器械产品。1959年举行的首届全运会上,春合提供了全套的专业体操器械。

岁月记录了“春合”的前进履历,展示了“春合”老字号从幼小到起步如飞的发展历程。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在首都体育馆观看体操表演。承制全套体操器械的春合,特意启用“中华牌”商标,一展中华民族崛起之魂。“中华”牌体操器械伴随着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一路奋向上,陪伴着李宁、童非、李小双等一代又一代体操

运动员从训练场走向赛场,见证了五星红旗一次次升起在国际大赛的赛场上。

1999年,第34届世界体操锦标赛来到天津,赛事筹备工作会议确定由春合厂和美国体育公司合作提供本次赛会的全部器材。其中单杠、双杠、高低杠、吊环和踏板5种器材,由春合厂与美国“AAI”公司合作生产,其余均使用春合生产的“中华”牌产品。国际体联对世锦赛专用器材的质量要求非常严苛,为了达标,春合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想方设法自筹资金200多万元,全部用于生产设备的技术改造和添置最新型质量检测设备。一年多的时间里,全厂上下全部心血都扑在新器材的研制上,功夫不负有心人,“中华牌”比赛器械经检测全部达到国际体联规定标准的上限,并如期交付给大赛组委会。在本次锦标赛上,中国体操队夺得4金,打破历史纪录;春合体育也蜚声国际,打开了海外市场之门。2001年,春合与美国波特公司达成技术合作协议,引进先进生产技术,弥补自身不足,加强了设备改造和车间整体规划,增添最新型篮球架及篮板生产流水线车间,改建800平方米的现代化标准生产车间。2002年底,春合与波特公司签订协议,由春合独家承担所有波特公司NBA篮球架订单。从此,由春合制造的篮球架走进美国NBA赛场和世界市场。

在百年的发展历程中,春合一直寻求突破和创新。2016年,春合厂完成公司制改革,更名为天津市春合体育用品有限公司。随后推行了职业经理人和市场化选聘经营管理者制度改革,通过调整结构激发内生活力。一方面继续稳固在体育赛事产品方面的优势地位,如为第十三届全运会提供场馆及篮球架产品,2019年成为第十届全国残疾人运动会举重和轮椅篮球比赛器材产品及服务供应商;另一方面,春合也瞄准普通级、民用型体育用品,带着高端产品线的先进设计理念和专利成果,从赛场走向市场,如儿童体操器材、少儿篮球架、社区健身器材、AI智能体测设备等一系列产品,都是目前春合重点发展的新产品。

向新发力、向智而行,打造“春合”在自我革新中不断淬砺。近年来,春合以“百年精品制造业”为核心,持续优化产品工艺,针对市场认可度高的双杠、跳跃平台、助跳板等主打产品,加大改造升级力度,从原材料供应体系和工艺流程等方面进行升级。2023年,春合销售体系同比增长20%;目前正在研发全新数智化产品。百年老厂,重新出发,春合的进取之心从未减退,未来我们将打造全产业链式的发展链条,聚焦高品质器材制造、特色体育培训、精品赛事服务等,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为老字号品牌注入新动能。

(作者系天津市春合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



全钢直沽桥(水彩画) 叶武文并图

直沽桥(原名奉化桥)全长257.3米,是天津市首座中承式全钢结构拱桥,全桥27道飞拱拱,夹在三道拱之间68片钢结构“花瓣”和296根吊杆,再加上钢桥面,共计使用7500吨钢,为我市用钢量最大的跨海河大桥。我的这幅水彩画,技法上将天空、河堤及建筑群统一色调并虚化,突出展现直沽桥梁曲线之美及镶嵌的“花瓣”钢板的轻盈灵巧,力图绘出一座具有强烈时代感的新型桥梁。桥梁主体上、下游两侧分别设置人行桥及景观步道,行人徜徉桥上,俯仰赏景,桥水对照,相映生辉。

2002年上映的《谍影重重》,颠覆了以往谍战片的固有模式,比起传统谍战片中自带主角光环的特工们,本片中的主角杰森·伯恩开局就是地獄难度——女友身亡,他忘记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卷入刺杀行动,还被反派嫁祸背黑锅。一路的追杀逃亡,杰森·伯恩完全靠个人实力斩荆披棘。一个如此低调的特工,主演马特·达蒙事先都不觉得影片会红。不料,第一部上映后,全球票房和口碑大获成功,后续做成了系列电影。

“谍影重重”系列影片至今共上映了五部,其中前三部是根据作家罗伯特·陆德伦的小说改编,被认为是一个完整的“谍影重重”三部曲。本周推介的就是三部曲中的完结篇,上映于2007年的经典动作悬疑影片《谍影重重3》。

唯有外貌寻常,才能大隐隐于市;唯有内在非常,方可一人抵千军。马特·达蒙能出演杰森·伯恩,凭借的是他与伯恩贴近的那一份平民气质。拍摄前,他接受了长达三个月的武器、拳击和格斗训练,亲自完成了片中大部分特技动作,他对



《谍影重重3》：不走寻常路的谍战片

何映晖

伯恩的诠释得到了原著作者的首肯。虽然外貌要低调,但是能力绝对不普通,杰森·伯恩具备怎样的特工素质?首先是观察力。杰森·伯恩没有全知全能的主角光环,逃生全靠硬实力。在第一部中,伯恩逃出大使馆就是其中的经典案例。匆忙而行的伯恩,在走廊里瞥到一张消防地图,立马停下来,并以此计算逃脱路径。在第二部里,伯恩查看地铁时刻表,合理布局,虚晃一枪,获得最优逃生路线。其次是高超的演技。秀车技算是特工片的传统技艺,伯恩仅凭一辆老旧小型汽车,开出了超绝的气势,而且飙车戏已经成为“谍影重重”系列必备的招牌场面。在之后的每一部中都有创新升级。再有就是顶尖武力值。伯恩的格斗主打一个务



实,没有高科技武器的支援,有时甚至连枪都没有。赤手搏击打一个什么拿着顺手,什么就是武器。圆珠笔、毛巾、书本都能成为攻击利器。在第三部里,伯恩在摩洛哥上演房顶大追逐,成为该系列的最佳打斗场面。

作为《谍影重重》系列三部曲的收官之作,良忆特工杰森·伯恩的记忆拼图即将在本片中拼凑完整,他的行动也更加国际化,足迹遍布三大洲。从莫斯科的脱困、伦敦的反跟踪、马德里的调虎离山、丹吉伦的房顶追逐,一直到纽约的亡命追车,杰森·伯恩的真实身份即将在《谍影重重3》中最终揭晓。

8月10日22:22 CCTV-6电影频道与您相约《谍影重重3》,8月11日15:32“佳片有约”周日影评精彩继续。

沽上丛话

